

近衛政治的

歷史背景

增刊第十二號

時興潮社編印

一九四一，三，一六。



譯者序言

近來，附帶或專門研究歐戰的刊物，真似雨後春筍，充斥坊間。可是，多半係偏重理論，敘述變象的文字；很少有材料來源真實，描寫生動流暢，專門揭發事前伏臘，說明幕後動機，讀來且覺津津有味，同時可以做為考察過去，明瞭現在，透視未來的好文章。

恰巧，現在找到了一篇，正是合乎我們所要求的，足以彌補上列一切缺點，原題是「革新政治與森恪」，作者以日本政客森恪為經，以所謂日本革新政治為緯，編寫得像一幅圖畫似的，把二十年來日本政治外交內幕，用一萬數千字，完全貢獻於讀者眼前，只要費幾分鐘的工夫，讀它一遍，就可以知道：現在日本首相近衛的來歷、脾性和無能，近衛新體制的源流，大陸政策施行前後的經緯，軍閥干政情形，政黨沒落的理由，政客轉變和投機取巧，日本內政外交步調的紊亂徬徨與矛盾，破壞中國統一干涉中國內政，滅亡中國的陰謀詭計等等。

因此，在這抗戰進入第五年，行將接近勝利，知彼愈要迫切的時候，特爲讀者譯出，或可供爲國人研究敵情資料的一助。

二月十五日於時與潮社編輯部

近衛政治的歷史背景

山浦貫一著
李春霖譯

中央公論——十二月號，東京

新政治體制乃是近衛文麿的「特許專利品」，不過，指點給近衛以新體制方向的——誘導革新政治的人，到現在都死去了，那就是森恪與志賀直方兩人。所以，論述近衛新體制的歷史的必然性的時候，不可以忽略了森恪與志賀直方。但是，他倆感動近衛時所擔任的部門與角色則各自不同。志賀直方好比是大久保彦左衛門（註見末頁）是近衛家的家臣。森恪則爲近衛的友人，彼此保持着平等的交誼，他認爲要想革新日本國政，以近衛爲最適當，遂誘導起近衛來了。

志賀直方是爲了報答近衛的先人霞山公爵（譯者按：霞山係已故近衛之父近衛篤麿之別號）的恩義，寧願以家臣的資格盡瘁一生的去扶育近衛爲政治家的志士浪人，他是小說

家志賀直哉的叔父，和建川龜次同期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但在上尉階級時就退出現役了，其後就做個幕後人扶育他現在的主人近衛文麿。第一次近衛內閣的成立，總算是滿足了他的願望，但至近衛內閣末期不幸死去了，森格和志賀直方當然是爲的近衛的出頭，而進行着政治會談。不過，如前所述，志賀直方的一切打算，完全是爲了近衛，而森格的打算則在於利用近衛以便革新政治。兩者的不同之點即在於此。

我爲了寫森格傳也會過近衛，和他要過材料，他當時給我寫了一篇序文如下——看去倒不是虛應故事的，的確是一篇切實的富於追懷森格熱情的好文章。

「森格是一個近代日本所要求的『革新政治』的先驅者。他由盛行政黨政治時代起，就痛切的感到新政治體制的必要，可惜正在實踐途中，壯志未竟就長逝了。如果他還處世的話，一定能夠確立了軍、官、民一體的新政治體制和我繼續朝向同一方向邁進。像森君那樣的熱情與行動旺盛的政治家，在今天是最高爲需要的。想來，真是失去了一位令人惋惜的人物。深深地埋在地下森君的壯志正在漸次地影響着日本政治，所以他的身軀雖然死

去，可是他的壯志並未毀滅，由這一點看來未嘗不足以安慰各位革新同志。

森君和我的交際，是由大正九年（即一九〇〇）開始，當時流行的惡性感冒，竟會促令兩人結交，說來真是一段奇緣。我是由巴黎凡爾塞會議完畢，回國後不久患的病，由伊丹博士診療，同時森君也在帝國旅館害病了，還犯了肺炎，據說病勢很嚴重，伊丹博士已經通宵地爲他看護了三夜了。當時伊丹還給我講了一些有關森格的故事。翌年春天，爲了病後靜養，我去到鎌倉海濱了，森君也來到那裏，由岩永裕吉介紹，我才和他會面，當時我三十歲，森君比我大個七八歲。

大正十年由貴族院和衆議院的青年們成立了一個憲法研究會，特別熱中於研究有關時事政治，外交以及改革貴族院等等問題。這個憲法研究會，是我和森君在海邊沙灘上一邊晒太陽一邊談論時發起的。這在我來講，真是一個頗足令人懷想的結社。森君是一個貴衆兩院縱斷論者，所以他主張政友會和研究會應該完全掌握政治中樞。可是我呢，與他的意見不同，是一個反對此種主張者。其後，在第二次加藤內閣時代，我任研究會首席常務

員，擔任和政府聯絡的角色。因此，他好像把我看做是憲政會派了。雙方遂一時斷絕了交往，從此總沒見面。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五月，在駒澤高爾夫球場，和他作久別後的會面了，這時森君的政治立場，非常的進步，已經轉變為一個非「政黨政治論者」了。他對我說「日本社會正在激變中，如果不改變什麼政黨或貴族院等等狹隘的思想，一定發生意外事變」。

當時我聽了他的說話，心裏非常慰快。同年三月發作起來的與議會攸關事件，也是很久以後，經有馬賴章告訴我才知道的。由於森君正在這一個激變的事件中心，所以終於不能拘拘於政黨或貴族院等等小的範疇了。我受到了森君的感動，結果，我的眼光轉向到新的時代潮流方面去了。因此，由森君之介紹，才得以和軍部與革新勢力方面的人們會合，對於滿洲問題，我也特別關心了。所以，森君實在是一個誘導我走向新體制方向的先輩。他是一個以熱情行動與感化力領導同志站在時代的尖端的先鋒。我知道在今日以革新政治家的資格立身於社會的人們之中，就有很多是受過森君感化的。」

昭和六年總算是日本內政外交雙方開始準備新的建設工作的可紀念的年頭——昭和五年冬天的五十九屆議會中，濱口首相因在病中，由幣原外相代理首相了，森恪的目標是打倒田中內閣以來的所謂幣原外交，恰巧在議會之中，代理首相幣原犯了「重大的過失」，這却成了森恪找錯兒的一點。當時日本政界關心的問題是倫敦條約，海軍方面以及着着走向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革新勢力，對於奏請日皇批准該約的濱口民政黨內閣的反對聲勢，猛烈地發作了。

濱口內閣斷定：並不能因倫敦條約而危及日本國防。可是濱口內閣的海相安保清種，在會議中對於濱口的斷定却答辯道：如果照這個條約來講他是不負國防上的責任的。所以倫敦條約問題已經不只是兵力多寡的問題了，而是因爲正在胎動期間的右翼革新運動業已展開了的緣故。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以打倒追隨英美的外交，打倒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外交爲目的的革新派和以重臣爲中心的維持現狀派的對立，已經逐步表面化了。在此種危險期間，代理首相幣原竟而犯了「重大的失言」，地點是在衆議院預算總會席上，質問

的人是政友會的中島知久平。中島的質問如下——

「在上屆五十八屆議會席間，濱口首相和幣原外相曾聲言：倫敦條約並不是危害日本國防的，可是前幾天在本委員會席上，海相安保清種曾答辯道：以倫敦條約而論，在推行日本作戰計劃方面講，日本的兵力是不夠的。這裏就發生矛盾了，濱口首相和幣原代理首相該怎樣解釋這個責任呢？」

雖然是一個當選後不久的小卒，可是非常討厭地徧徧衝擊你的要害，幣原對於這個質問答覆如左——

「在第五十八屆議會中，濱口首相和我，倒是說過，倫敦條約不是危害日本國防的，現在，該約已經由天皇批准了，既經天皇批准，這個條約顯然不是危害國防的。」

不用挑剔他所說的話，就可以知道：幣原的意思是把責任推給天皇了，打算逃避他奏請批准的輔弼責任。而且他以爲用這句話不啻像投給反對勢力（海軍方面和革新陣營方面）的一顆炸彈，感覺特別痛快；但是，這顯然是一個大大的失敗。而當楊捉住這個弱點的

乃是當時的政友會的幹事長森格。因此，議會遂混亂而又混亂，其後經過十天的工夫未曾開會議事，倒閉運動由院內院外猛烈的發作起來了。這個倒閉的中心人物就是森格。森格的計劃當然是在於首先解決當前的問題——打倒爲維持現狀派前鋒的民政黨內閣，而且更探謀遠慮地企圖乘機一下子把日本政治轉變到革新方面去。

近衛在序文中所說的昭和六年三月與議會攸關的事件還算是一個歷史的祕密；不過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爲了建設而發起的準備工作。可是這個準備工作線上却有森格在。森格的確是一個政黨政治家，然而森格由政黨鼎盛時代起，已經就深切的感覺到必須施行新體制政治，爲了創造新時代，須利用政黨的現有勢力，當時的政友會，的確熱心於倒閉運動，可是對於倫敦條約的本身，決不是反對的。大多數人們不過是由於在野黨的心理，爲了倒閉而不放鬆這一問題。森格則是一方面利用此種黨人心理，一方面以革新政治爲目標甘願被人稱爲黨內的叛逆者。

昭和六年五月，在駒澤高爾夫球場與森格作人別後的會面的近衛，由森格那裏聽到了

羣新勢力的抬頭以及滿洲問題的嚴重等等現實消息，他才突然覺得應訂心機，不禁愕然。他由於受到了森格的刺激，才開始與陸軍方面的小畑敏四郎，鈴木貞一，荒木貞夫等人會面，由森格介紹才和那所謂現在革新外交界最有希望的小畑敏夫相與。原來，近衛這個人血潮之中就是富於革新腦子的，可是他不是一个與任何軍人的脾性都一致的人品。他自來就沒有自動的和軍人會面等等氣量。所以，在軍人裏，與其促膝縱談國外大體政策和國內革新政治的必要性的，大概要以小畑、鈴木、荒木等人爲濫觴。

現在有一件趣話須待描述，即是說：白鳥敏夫現在雖被稱爲打破現狀的急先鋒，革新外交界的最有希望的人物，可是當初與近衛相會的時候，却是一個幣原主義者，就是對於解決滿洲問題的方策等等，他也是溫穩穩實地担心第三國的意志者。可是此種觀念，由九一八事變起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角度。關於此點白鳥本人也這樣對我說過，同時近衛也是如此看法。這都是受了森格的熱情、行動與感化力的作用。

「我知道在今日以革新政治家的資格而立身於社會的人們之中就有很多是受過森格感

論。

以上近衛所說的人們之中的一個，的確就是白鳥。

近衛的新體制機運，是由二十年前與森格一同發起憲法研究會時開始，至少是以改革貴族院問題爲出發點，但是近衛和森格途徑的出發點亦在於此。近衛的政治思想是由舊的英國派的議會主義出發，他認爲在尊重政黨內閣的責任方面講，貴族院是不應該越權干涉政治的。但是森格則是一個富於「力」的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視現實的政治家。雖然他的本來的性格不是一個民主主義的政黨政治家可是入了政黨就掌握住了政黨，利用政黨，主張全面改革貴族院論，同時，爲了獲得現實的力量，企圖連絡政友會和研究會全面的控制貴衆兩院。因爲這種關係，遂一時和近衛絕交，關於這些是非，姑且不談，總之近衛新體制的源流：最先是在老早的原敬內閣時代，由其與森格在鎌倉海濱旅館計劃的憲法研究會起，中經昭和六年五月若槻內閣時代在駒澤高爾夫球場，由森格說明新體制胎動論——所謂第二段，一直到十年後的今天才具體的搬出來的。此外，以森格爲中心的革新勢力方面，

在當時就感覺有轉換政治的必要，即擬以平沼、近衛、荒木爲將來的主要人物，而由他們三個人之中選擇其一，使登場面，以便達到目的。做這個計劃的中心人物當然是森格。

如前所述，昭和六年，的確始終是一個爲了走向新建設而大肆破壞的年頭。由三月事件以至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更於十月間國內又發生了問題，這又是一個成爲歷史上的祕密革新事件，幸經防於未然，沒有擴大。此種局勢，接續不斷地促令政情陷於不安，第二次若槻內閣在該年年末倒台，大義政友會內閣產生。從此，森格遂以伊東已代治以後的內閣大書記官長資格，領導內閣全體，企圖一下子解決了大陸問題，把內政拉到一國一黨的途徑，可是他這種志願並未成功。

他的目的如近衛的新政治體制的最終目的，在於軍官民打成一片。更深切講，也就是說，只有政略與軍略完全成爲一種化學的溶合，才能從事高度國防建設或百年戰爭。

森格一方面唱言要想完成大陸政策，軍部與政治家必須密切的合作，同時他還是一個村語實踐的政治家。昭和二年乃是政黨政治鼎盛時代，當時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風聲

「軍閥」。同是風靡一世的。直到現在，軍人們還想了當時的情景還在說：「民衆多嘆曰眼窺視軍人，穿着軍服甚至都不敢坐汽車和電車」。想到了今日軍人的威勢，覺得過去的情況真是像一個夢幻似的。彼時正是民主主義勝利者，如中野正剛，永井柳太郎等輩，大顯威風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森恪就把這種風氣嘆爲亡國的世相。他覺得政黨和軍部，如果不能渾然的成爲一體，決不能解決大陸政策。

正當這個時候，蔣口口（譯者按：指我蔣委員長，餘同此。）所統帥的北伐軍由廣東北上直迫南京武漢，南京事件和漢口事件相繼發生，於是森恪遂偕同山本條太郎，松岡洋右等人，以政友會的代表資格前赴中國各地從事考察。當然，他們是會見了蔣口口，加倫，鮑羅廷及其他要人因而得到了一個結論——他感覺到「剔除在「滿洲」的蘇聯勢力，確保「日本生命綫」，實爲最大急務」之後，就回國了。當時有現任陸軍中將鈴木貞一和已故海軍大佐岡野俊吉，在漢口附近負着特別任務，從事遊弋。這兩個少壯軍人和森恪的交際，就是由此開始，並且成了森恪與陸海軍保持密切聯繫的開端。

據鈴木貞一說：「森恪是痛切感覺到政黨和軍部必須團結一致的，可是這個思想和當時的輿論却呈現着一百八十度的相異。而想推測當時鼎盛的幣原外交政策、追隨歐美主義以及不干涉中國主義等輿論，森實是一樁難事。但是，森恪竟能不顧及這些，躬親實踐其思想。」

在此次「中國事變」期間，進行南甯戰爭時，陣亡的上尉森新，就是森恪的長子。森恪由考察中國得來的結論，表現為具體的事實的，就是叫他的長子森新就學於陸軍幼年學校，而且特別叫他的兒子選修俄語。他的親戚和朋友對於這個舉措很是驚訝。因為如前所述，當時的軍縮狂風，吹遍日本全國，當軍人的，竟至不敢穿着制服去乘電車，在這一個人時代，竟叫他的愛兒進入陸軍幼年學校，未免太有點好奇。但是，他對於這些非難和誤解決不置辯，詞。森新順利地考入幼年學校以後，他非常喜歡，特邀請他的兒子在帝國旅館吃他所喜歡的洋餐。

森新入學不久，因一次普通感冒而發，結果竟致發為內臟病之重症。這期間中國國內由於

張作霖炸死事件，以及因出兵山東而造成的濟南事件等案；給與人們一種印象——當時的評論家倡言田中的外交爲反動外交，尤其當內務大臣鈴木喜三郎，否定了民政黨所說的議會中心主義，改唱皇室中心主義的時候，更被一般人特別攻擊爲反動政治家了，終於不得不單獨辭職。而這一反動到了今天居然成爲「正動」了，想來不禁有隔世之感。

到現在已經沒有否定九一八事變的人了。可以認做九一八事變的前提——張作霖炸死的事件，到現在人們的腦子裏記得還很清楚，可是當時的河本大佐却因負責而被免職——河本當時爲關東軍高級參謀，現任滿洲鐵礦理事長。當時民政黨裏的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剛等人都是幣原外交的前衛鬥士，曾藉口該事件而大唱其打倒田中內閣論。甚至身爲首相的田中大將以及陸軍當軸之中也很有些表示召開軍法會議糾察關東軍的責任，企圖避免在野黨之攻擊的。可是，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格，却強硬的予以反對，荒木貞夫大將當時爲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和森格同樣反對召開軍法會議的提案。至於他們因爲什麼，反對我們是無由得知的，但以後河本却在和森格的友誼之下，得免於死，並且由於森格的推挽得任滿鐵

理事，其後更轉任爲滿洲煤礦公司的理事長。關於這些事實都是在森格死後才曉得的。

田中內閣時代，森格任職外務省政務次官。當時的外務大臣由田中首相兼任，所以森格係事實上的外務大臣。誠如近衛評論森格時所說的一樣：他是一個富於熱情、行動與異常感化力的政治家，所以他和一般的官場似的政務官，完全異趣。最初，上至次官出淵勝次下至局長課長等人，莫不輕視這位政黨黨員森格，但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森格竟把外務省裏的幣原主義者和幣原的人位都排擠出去了。派出淵爲駐美大使而提升其過去心腹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爲次官。至於白鳥敏夫，則在其後吉田轉任爲意大利大使時，才做爲森格談話的對手，繼任吉田的遺缺。

森格在任半年期間，就把外務省的人事和機構都掌握到自己手裏了。關於重要事項完全由森格、吉田次官、植原參事官和各該主管局長決定一切，由校閱外交文書以至訓令電報等細事，無不經過森格的同意。田中兼外相對於通常事件，向不過問，並且恐怕干涉不當，反而招致森格的抗拒。